

五色石丛书
WUSHISEN COLOSSEUM
文艺研究新视野

李佳 著

《国语》研究

五色石

Study on *Guoy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五色石丛书
WUSESHI CONGSHU

文艺研究新视野

李佳 著

《国语》研究

五色石

Study on *Guoy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语》研究/李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161-5503-5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史籍
②《国语》—研究 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49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武兴芳

责任校对 李立峰

责任印制 戴 藏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提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刻，站出了一位曾经抁土造人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本书系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可以引发创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何况人们又说女娲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入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姬，惊天入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黄周星《唐诗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仝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这就把伦常幽默、月宫神话，也交织到炼石补天的神思中了。更杰出的

创造，是把炼石补天神话的终点当作新起点的创造。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把女娲炼石补天时被弃置的一块顽石当作通灵宝石，带到人间走了阅尽繁华与悲凉的一遭，写成了“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天书”与“人书”相融合的精神启示录。由五色石引爆的这些奇正创新，综合创新和跨越式原始创新的丰富思路，应该成为我们书系的向导，引导我们进行根柢扎实，又五彩缤纷的学术探索，或如宋朝一位隐居黄山的诗人所云：“我有五色线，补袞袞可新；我有五色石，补天天可春。”（汪莘，《野趣亭》）

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世界视野空前开阔，创新欲望空前旺盛，学理思维空前活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思想学术文化已经以其无比丰厚的成绩走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我们也迎接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扑面而来的机遇中的严峻挑战。高科技对文学生存方式的强势介入，市场机制对文学生产的批量性推动，消费时尚对文学潮流的极端吸引，以及网络、图像参与其间的新媒体文学表达形态，包括林林总总的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文学等形态的火爆滋生，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今日之文学已远非昔日之文学了。对于原有的文学格局、形态和秩序而言，这里所面临的泛化性的消解和创新的包容的挑战，严峻地考验着当今学术界的学理担当能力。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一些与女娲神话类似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危机，大概也不应被看作是危言耸听吧。那么，又从哪里找到补苍天的五色石，立四极的鳌足和止淫水的芦灰呢？若能够由此写出女娲炼石补天的新篇，也是本书系不胜翘首企盼的。

令人满怀信心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百摧不磨，往往在艰难的挑战中出现超强度的爆发，在爆发中显示了坚毅的魄力和深厚的文化元气。浩瀚雄厚的多地域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实践，成为它层出不穷地为人类提供文化经验和创新智慧的不竭源泉。且不说旷世莫比的少数民族神话，即便中原神话虽未衍化为长篇英雄传奇，却散落为遍地开花的民俗奇观。五色石在历朝志怪和许多地理志中，屡有记载，女娲庙在甘肃秦州有，湖北房州也有。女娲抟土造人处据传在汉武帝《秋风辞》吟咏的汾阴，女娲墓则在九曲黄河最大的弯曲处古潼关

附近的风陵渡，因为女娲风姓，风陵也就成了娲皇陵了。中华民族是把自己的母亲河和这位创世女神连在一起的。五色石散落之处有广东产端砚的山溪，《元丰九域志》云：“端溪山有五色石，上多香草，俗谓之香山。”明代诗人说：“女娲炼馀五色石，藏在端溪成紫霞。天遣六丁神琢砚，梦中一笔夜生花。”（张昱，《题端古堂》）既然五色石散落岭南，那么炼石的灶口在哪里？在太行山。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说：“石炭即煤也……（山西）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五色石通过创世女神之手，成为一种天地交泰的文化生命结晶，它一头联结着赋予人类生存以温暖的“坚黑而光”的能源，另一头联结着文化创造的“梦笔生花”的灵性。在如此浩瀚无垠的天地、人类、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新世纪的文学学术创造，尽管阅尽风云变幻的价值重建、形式变换和文学边界模糊，但我们的民族也有足够的底气、智慧和能力，在文学研究中注入充满活力的人类审美本性的精髓，从中焕发出现代大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品格和创新气象。

明诗有云：“五色石堪炼，吾将师女娲。”（周瑛，《至广德作东园书室》）是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调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智慧，拓展新视野，提出新命题，给出新阐释，师法女娲炼石补天的原始创新行为，炼造出一个东方现代大国的思想学术的五色石的时候了。

杨义

2008年6月1日

序 一

李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的博士生，我审阅了她的毕业论文，感到论文写得极为扎实，是我几年所见之博士论文中的上品。后来参加她的论文答辩，李佳待人彬彬有礼，回答问题清晰有据，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当我得知她应聘国家图书馆工作，十分高兴。李佳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四川大学，博士又出自名师门下，这样的人才，能来国家图书馆工作，自然是做馆长的一件幸事。国内高校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大学之大，不在高楼，而在大师。大师之谓如今已经用滥，但是说“大家”总是应该恰当的。大学如此，国家图书馆亦然。广厦千间，文献海量，但是没有一流的学者，怎能做出一流的业务？不过李佳最后还是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我既理解她的选择，为她一家团圆而高兴，但是也为国家图书馆惋惜。

《国语研究》一书，是李佳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此书全面、系统研究《国语》，不仅厘清诸多关于《国语》的固有问题，而且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获得新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国语》的性质问题。《国语》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影响很大。但是《国语》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书？一直充满争论。比较传统的看法是国别史，又有史料汇编说，等等。此书辩驳了几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只有把此书记“语”的形式特点以及弘扬《春秋》大义的深层意图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此书的性质。并依此提出：“外传”是此书性质的准确描述。答辩委员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李佳此说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李佳此说，是基于今日的学术视野和态度，对《国语》性质问题的审慎思考与定位，所说有根有据，言之成理。

作为文学博士论文，李佳的研究重点自然要落到文学上来，因此，此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语”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归纳、分类了《国语》中“语”的形式、内容；对该书所记载的“对话”，从对问、论辩和沟通的角度，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并且以先秦语书的发展为背景，探讨了《国语》篇章结构的特点。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李佳此书得出结论：《国语》是先秦“语”类书的代表作。这就从文学的角度，揭示了《国语》的文学史价值。

当然，《国语研究》一书，用力最大、体现功力最深的当是其对《国语》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国语》有公序本和明道本两个版本系统，但是，公序本在宋元明时期的刊刻、修补和流传情况，一直未能有人说清楚。李佳此书通过对版本的调查，首次厘清了这一版本系统的历史脉络；对其他版本的价值也作了准确的评价。而在目录学方面，李佳通过梳理史志和各种目录中关于《国语》的记载，证实了此书流传有序的情况，还对其记载疏漏之处进行了补充和辨证。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都为《国语》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前些时，我和从新加坡回国休假的李佳夫妇见了一面，知道他们在那里工作很顺利，已经在大学立稳了脚跟。而此书的出版，相信也一定会奠定李佳在学术界的基础。以李佳的资质和努力，我期待她有更多更优秀的成果面世。

詹福瑞

2014年11月9日北京天空突然变蓝的日子

序 二

先秦典籍因传世久远，其作者及编纂原貌往往湮没无闻，可以说每一本典籍都存在着很多难以说清楚的疑问。当然，每一书的存疑情况不尽相同，其中最为复杂的自然属《左傳》和《国语》了。《左傳》一书复杂到了其是否为伪书的地步，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论著，并成为“《左傳》学”的重要内容。《国语》的复杂，则与《左傳》有关。与《左傳》相比，《国语》似乎所受到的关注较少，古今学者甚至有的仅将其视作史料汇编，这自然降低了其学术研究的价值，这个评价显然在对《国语》性质的判断上发生了差误，仅将其视为《左傳》成书的附属物，那么，《国语》与《左傳》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国语》的性质如何判断呢？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不能很好地理解《国语》，也影响到对《左傳》的研究。因此，我们说《国语》一书也十分地复杂。

《国语》复杂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如何判断此书的性质。《国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国语》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在“六艺略”“春秋”一类中，此类以《春秋》古经起，有《春秋》经与诸傳，又录《国语》《国策》《世本》及《太史公书》，是作为经部的附类看的，也是汉代史学附于经学的证明。不过，史学尽管要到魏晋以後始脱离经学，但史学不能等于经学，汉人还是很清楚的。因此《汉志》的这种著录，还是将《国语》视为史书类。

《国语》著录为二十一篇，题为左丘明著，又列有《新国语》五十四篇，题为“刘向分国语”，是见二十一篇为原书，五十四篇为刘向据《国语》重新编定。据此，是《国语》分八国之语事编为二十一篇，应是文献旧貌，而非如《国策》一样，经刘向编定，否则刘向不会另行再编五

单纯的语体，而是语与事的混合体。这可能是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一种特殊的文体。就像《国策》一样，记载有许多战国游士的策文，本应列入纵横家而列入史实，可能即如刘向所说：“其事继春秋以後，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事皆定。”刘向重其事，而非重其言，故列入史家。实际上《国语》和《国策》都是语和事的混合体，是先秦语、事由分而合的新文体。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帛书，其中有半幅记春秋时事文字，内容与《左傳》《国语》多相合，考古学者定名为《春秋事语》，是对这种文体非常准确的判断。

《国语》一书既牵涉到性质的判定，也有作者的问题、其与《左傳》的关系等，因此说它复杂，一点也不为过。除此以外，《国语》一书的版本，长期以来似乎为学术界所忽视。《国语》自刘向整理以後，至东汉有贾逵、虞翻、韦昭等人注，皆注二十一篇，其中最以韦昭注著名，影响至于当代。《国语》一书的刊刻，始自宋代，现存宋本尚餘两三种，但也多为递修。学术界当前利用的主要是明金李泽远堂刻本及清人黄丕烈校刻的天圣明道本，前者因《四部丛刊》影印，便于使用，故流传较广，後者因黄氏为清代著名目录学家、校勘学家、藏书家，其书因黄氏精校而著名。相对来说，清以来学者用黄氏士礼居校刻本较多。但学者知于利用，对这两个版本的特征和不同，却往往不明。这些问题当然需要解决。我以为版本不明，则无以判断文献材料之得失，材料依据如有误，则影响结论的正确与否。但版本问题绝不是版本学家的事，版本学家可能关心古籍版本中普遍的问题，不可能对每一本书的版本作深入调查和研究，但对专书研究者来说，就不能置版本问题于不顾了。

李佳博士就是这样的研究者，她这本名为《国语研究》的专著，并没有局限于《国语》一书的编纂、文本内容的理论探讨，而是先从目录和版本两方面对《国语》一书进行文献清理。自《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後，《国语》二十一卷本经汉晋学者，尤其是三国韦昭注，成为後代学者利用的史学名著。先秦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往往有所变动，如卷数多寡、篇序移易等，但《国语》一书很明显在历代著录中保持一致，今传二十一卷本，保留了刘向著录时的原貌，这是很难得的事。不过，虽然书的形态没有变化，但从著录中可以看见古今学者对本书性质

认识的不同。自《汉书·艺文志》将其系于六艺略“春秋”类之後，这种影响一直到明代才发生变化，後人以其归于史部的“杂史”类中，这也是通过文献清理得到的认识。本书对版本的清理，是作者所下功夫较多，收获也较大的部分。《国语》一书虽变动不多，但版刻也存在有不同，李佳通过调查，分为公序本和天圣明道本两大系统。历史上公序本影响较大，公序是宋庠的字，他曾取十五、六种官私所藏《国语》以校其所得宗人宋緘所藏本，用功甚勤，又作《国语补音》，北宋国子监因据以刊刻。此本成为後世刊刻之祖本，至明则有金李泽远堂覆宋本，因为《四部丛刊》影印的缘故，对当代学者影响较大。不过，清代以来学者对《国语》版本的利用，所看重的并非金李本，而是黄丕烈士礼居读未见书斋所刻本，其本据黄氏称，乃据宋天圣明道本。因了黄丕烈的名气，清代以来学者多认同黄氏这个刻本，笔者以前亦持此看法。但据李佳博士认真比对，她认为宋天圣明道本仅在钱谦益的《绉云楼书目》中著录过，其後因钱氏书焚于火灾，此宋本就此失踪。所幸能传下来的仅有钱曾和毛氏汲古阁两个抄本，黄丕烈的重雕本就是据毛氏汲古阁抄本，并参以其他校本勘定刻成。通过对比，李佳博士的结论认为金李泽远堂本较黄氏重雕本为优。这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结论，是我们今後利用《国语》的一个重要参考。

对《国语》的编撰和性质的判断研究，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李佳根据史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仔细分析，她认为左丘明编撰旧说应该可信。自两汉以来，怀疑左丘明的学者并不多，有之，所据理由亦不甚充分。但到近代，因疑古思潮的影响，遂大张旗鼓，罗列疑难，质疑旧说，妄生新论，其实证据多由疑而生，并不能固垒。姑不论李佳的结论如何，她的学术态度是我欣赏的，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即在没有可靠的新证据之前，宁愿信古。本着这个态度，她对近代以来有关《国语》的作者、性质、与《左傳》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仔细清理史料，对赞成和反对的意见，皆逐一分析其立论依据，在纷纭复杂、丛脞繁难的众说之中，析疑辨惑，树立己见，不偏不倚，力求客观。她的论文在毕业答辩时，得到了评委老师的好评，并第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李佳博士原是四川大学古文献专业毕业，师从罗国威教授，受到了

很好的文献训练，考入北京大学後，从我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她的文献感觉很好，看问题也很敏锐，概括能力强，对老师布置的作业和提出的思考问题，往往能迅速抓住要害，并能进一步深入挖掘，提出新观点，作出新解释。她是年轻学者，对新理论和方法学习和掌握都比较快，所以在汲取当代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和观念、方法上，都显示出年轻学者的特点。以她古文献的基础，结合新时代的学术研究，相信她会取得令人期待的成绩，而这本《国语研究》就是一个证明。李佳博士现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在繁忙的教学之际，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她人虽在国外，但对国内的学术动态十分关心和知晓，并常参加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学术会议，发表她的最新研究心得。此书原为她的博士论文，但经过多年修改，现在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请我作序。我对她的学习有所了解，对她的学术发展也有所期待，故欣然应命，写下上述的话，权充为序，并祝李佳博士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

傅 刚

2014年11月

绪 论

从甲骨卜辞的简单文句，到《尚书》、《春秋》简洁的记言、记事，再到《韩非子》的长篇专题论文、战国策士纵横捭阖的游说之辞，先秦散文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发展后，慢慢走向成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发源滥觞，更成为一座拔地倚天的高峰，韩愈提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①的观念，后世的古文学家奉为“文章正宗”^②，可谓推崇备至。《左传》、《国语》是先秦散文史上非常重要的两部典籍，它们关系十分紧密。两书都主要记载春秋时期的史事，且有近七成的内容可以互见，一直有“内传”、“外传”之称，但是它们受重视的程度却迥然不同。前者“以先秦文学的一种具体形态，兼具了现代学术立场上史学、文学、哲学（具体表现为经学）的特质”^③，而一直受到人们的尊崇，其地位固若金汤向无争议。但后者的命运却似乎有些尴尬：《国语》又名《春秋国语》、《春秋外传》、《春秋外传国语》^④或直接简称《外传》^⑤，显示它与《春秋》经有着密切关系，但柳宗元却指责《国语》“背理去道”^⑥，否定其思想；唐刘知几将《国语》列为史体六家之一，《四库全书总目》将之归入“史

①（唐）韩愈撰、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9页。

② 宋代理学家真德秀的文章选本《文章正宗》，选入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的片断章节。《文章正宗》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四十总集类二”。

③ 常森：《20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按：本书吸收、引用了许多前修时贤的意见，为了避免行文重复，一律略去“先生”称谓。

④ “春秋国语”见于许慎《说文解字》和应劭《风俗通义》等书；“春秋外传”见于《孟子》赵岐注和《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春秋外传国语”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

⑤ 《史记·吴世家》裴骃引贾逵注和《尔雅》郭璞注。

⑥（唐）柳宗元：《柳河东集·非国语》卷四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88页。

部杂史类”，然而崔述斥其“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①，抨击其内容；黄震称赞《国语》“宏衍精洁”^②，朱熹却批评其文“委靡繁絮”^③，为何这些判若云泥的评价都集中在《国语》一书上，是值得深思的。

《国语》二十一卷，其中《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分别记录了从西周中叶到春秋、战国之际各国的历史片段，各国“语”中的篇章长短不一，彼此之间不相联属，但基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该书主要记载人物对话，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④，不仅保存了大量西周春秋时期的臣子谏上料事的精彩言论，更有许多对道德思想、礼法制度、宗教祭祀以及神话传说的记载，是今人了解彼时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

《国语》是先秦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它直接继承了《尚书》的记言传统、吸收了《春秋》褒贬善恶的写作手法，并借鉴了《诗经》“十五国风”分国编纂的体例，形式独特、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先秦著作。

一 《国语》研究现状述评及其选题意义

20世纪以前的《国语》研究情况，已经有不少学者作过总结，为避免重复这里只简单概述。总体上说古代的《国语》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方面：一、注释雠校；二、《国语》成书问题；三、文学评点。第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是传世至今的几部《国语》校注本，如三国吴韦昭的《国语解》、清洪亮吉的《国语韦昭注疏》、清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以及清董增龄的《国语正义》等，直到今天这几部著作还是我们研读《国语》的基础。第二方面集中在《国语》与《左传》的关系探讨

①（清）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2页。

②（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二，（台北）大化书局据日本立命馆大学图书馆藏书影印1984年版，第620页。

③ 朱熹：《朱熹集·朱子语类》“论文上”，卷一三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7页。

④（吴）韦昭：《国语解叙》，国图藏宋刻宋元递修本。除去有说明者，本书所引《国语》皆据此本。

上，然而基本为只言片语，散见于各家著作之中，并不集中。第三方面的成果主要见于明清时期出现的评点性著作之中。这些研究成果非常宝贵，有待我们进一步总结、继承。但古代的《国语》研究，具有先秦散文研究的共同缺陷，即“表达缺乏系统性”^①，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体系还存在一段差距。与古代相比，20世纪以后的《国语》研究尽管大体仍在上述三方面的范围之内，但于深度、广度和系统性上都有很大的推进：

第一，文字训诂、注释雠校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如石光瑛的《国语韦解补正》^②，最重要的当推徐元诰的《国语集解》^③，徐书大量汇聚吸收前人的校注成果，择善而从，并结合了自己的看法，是研读《国语》不可缺少的书籍。^④然而该书也存在不少问题，“除文字上的失误外，更时有重衍之文，或字句脱落，画蛇添足，乃至无的放矢者”^⑤，这些是使用时应该注意的。当代最早致力于此方面研究的是中国台湾学者张以仁，他一段时间专注于《国语》校注以及对旧义注、旧音注的整理工作，成绩斐然。张氏首先从虚词入手，完成了《国语虚词集释》^⑥。此后又作《国语校证》^⑦，稽考清人对《国语》的注释，并广采古注、类书以及相关书籍材料，案以个人见解，颇便读者。除了这两部专著外，张以仁还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国语札记》（一）、（二）^⑧和《国语韦注商榷》^⑨，均为校读札记，对韦注及诸家说法多所辨正。还有《国语旧注辑校序言》、

① 常森：《20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② 石光瑛：《国语韦解补正》，《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卷二，1926年第3期。

③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校点：《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 该书在注解上的特点，可参考周静《〈国语集解〉校注探微》，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⑤ 王树民：《国语集解·点校前言》。此外，南京师范大学戎辉兵的博士学位论文《〈国语集解〉订补》对徐氏疏漏有较为详细的考察，可参考2007年版。

⑥ 张以仁：《国语虚词集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卷五十五，1968年版。

⑦ 《国语校证》，（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

⑧ 张以仁：《国语札记》（一）载《大陆杂志》卷三〇，1964年第7期；《国语札记》（二）载《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下），（台北）清华学报社1967年版，第806—916页。

⑨ 张以仁：《国语韦注商榷》，载《孔孟月刊》卷二三，1984年第3期。

《辑校》(一)至(六)^①,以及《国语旧注范围的界定及其佚失情形》、《国语旧注辑佚的工作及其产生的问题》^②和《国语集证卷之一》(上)、(下)和《国语集证卷二(上)》^③等文章。《国语》旧音注久已无人整理,张以仁对之也用力甚勤,写作了《国语旧音考校序言》和《国语旧音考校》^④两篇文章,对音读的是非予以梳理。大陆俞志慧也在进行类似的工作,整理研究《国语》韦昭注,发表了一系列辨正文章^⑤。这些成果都为深入研究《国语》文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中国香港学者樊善标对《国语》韦注的研究也非常值得重视。这是另辟蹊径的探索,他前后共发表了五篇文章^⑥,分别对韦注的成书年代、韦昭对《国语》底本的整理情况、韦注使用《左传》的情况、韦注采取礼书入注的特点,以及韦注与孔晁《国语注》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樊氏以韦注为切入点,开拓了《国语》研究的道路,其研究成果

① 张以仁:《国语旧音考校序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41本第3分,第535—537页;“辑校”均发表在《孔孟学报》,刊数及页码如下:(一)载1971年第21期;(二)载1971年第22期;(三)载1972年第23期;(四)载1972年第24期;(五)载1973年第25期;(六)载1973年第26期。

② 张以仁:《国语旧注范围的界定及其佚失情形》,《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9—139页。(收入《国语左传论集》);张以仁:《国语旧注辑佚的工作及其产生的问题》,《“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研院”1981年版,第543—570页。

③ 《国语集证卷之一》、《国语集证卷之二(上)》均发表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刊数及页码如下:“卷之一(上)”载1972年第44本第1分,第89—151页;“卷之一(下)”载1972年第44本第2分,第153—225页;“卷二上”载1980年第51本第4分,第593—606页。

④ 《国语旧音考校序言》和《国语旧音考校》均发表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刊数及页码如下:“考校序言”载1971年第42本第4分,第563—569页;“考校”载1971年第43本第4分,第673—726页。

⑤ 现已知发表《〈国语·楚语〉韦注辨正》,《长江学术》2006年第4期;《〈国语·越语〉韦注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国语·吴语〉韦注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6期;《〈国语·晋语三〉韦注辨正》,《淮阴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国语·鲁语〉韦注辨正》,《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国语·晋语八〉韦注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徐元诰〈国语集解〉刊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

⑥ 樊善标:《韦昭〈国语解〉成书年代初探》,载《大陆杂志》卷九二,1997年第4期;《韦昭对〈国语〉底本的整理》,载《大陆杂志》卷九四,1997年第1期;《韦昭〈国语解〉用〈左传〉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1988年第7期;樊善标:《韦昭〈国语解〉用礼书研究》,载《中国文哲所研究集刊》2000年第16期;《孔晁〈国语注〉与韦昭〈国语解〉》,载《大陆杂志》卷一〇三,2001年第10卷第3期。

颇可借鉴。

第二，有关《国语》的编纂问题，其与《左传》的关系仍为研究热点。清末康有为进一步发展了今文学家刘逢禄否定《左传》的看法，在《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上）》公然断言《国语》《左传》原是一书，而后经刘歆改造为二。^①此后崔适为该说之积极支持者，其弟子钱玄同更依据二书所载此详彼略、彼详此略的特点，坚持认为《左传》乃刘歆将原本《国语》瓜分而成。^②今天看来，这派观点皆因太涉主观，臆度过分，缺少坚实证据支持，而显得没有太大学术意义，但在当时疑古思潮的推动下，此派观点竟一时间成为论争的焦点，不少学者撰文讨论。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的《左传真伪考》^③，此文开辟了文法考证古书的新途，引起了广泛关注，受高文启发，一些中国学者也使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研究。此外，美国学者卜德（Derk Bedde）发表了《左传与国语》^④，开拓了从语汇的角度研究两书的方法，同样启迪了后人的研究。^⑤除了尝试新的角度，更多的学者仍遵循传统的方法，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进行研究，如孙海波的《国语真伪考》^⑥，孙氏据《国语》所载重出于《左传》诸事，提出若二书为一书之分裂，则“不当沓纷复见”，所说有见；又通过两书虽记一事，所载亦复不同，推测“盖二书所据之史策不同，故其记载各殊”，与卜德的观点不谋而合，而论证较之为进。童书业的《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⑦通过对比《国语》与《史记》相同文字，认定《国语》成立在《史记》之前，因此根本不可能是刘歆伪造的。再从《国语》《左传》所载古史说之矛盾、纪事之重

①（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81—91页。

② 钱玄同：《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重印新学伪经考序》，收入《新学伪经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429页。

③ [瑞典]高本汉：《左传真伪考》，《格特堡大学学报》卷三二，第3号，1926年版。陆侃如将之译成中文，1927年在新月书店出版。

④ [美]卜德：《左传与国语》，原载《燕京学报》卷一六，1934年版。该文后收入陈雄、于大成编《左传论文集》，（台北）木铎书局1976年版，第11—17页。

⑤ 张以仁：《从文法、语汇的差异证〈语〉〈左传〉二书非一人所作》，后半部分即受此方法启发写成。

⑥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卷一六，1934年版。

⑦ 童书业：《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原载《浙江图书馆馆刊》卷四，第1号，1935年版。该文后收入《左传论文集》，第159—173页。